

詞典研究叢刊

5

四川人民出版社

詞典研究叢刊

5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词典研究丛刊(5)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7.75 插页2 字数200千
1983年8月第一版 198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00册

书号: 9118·32

定价: 0.92 元

目 录

继承前人成果 反映时代学术水平

- 《汉语大字典》主编徐中舒教授在第七次
编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二年一月八日）…………… 1

鲁迅谈辞书……………周启付 6

试论词典的通假处理及其意义……………陆锡兴 11

汉字单字的解说……………祝注先 29

从“瑟下孔”说起

- 对“越”字三义的考证……………夏蔚文 40

释肇……………倪文木 44

简评新版《新华字典》……………李景白 48

新编大型《俄语教学词典》（上册）

已出版发行…………… 57

字海拾零

- 谈《字汇补》的讹误……………倪文木 58

一本携带方便的《袖珍常用字典》出版…………… 61

综合性辞书百科条目琐议……………章锡良 62

试论大型字书释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

- 编写《汉语大字典》札记……………汪耀楠 67

《常用多音多义字》现改版发行…………… 82

语文性辞书释义中的“描写和说明式”……………张在德 83

资料工作是编写字典的重要基础……………鄯先觉 109

引书证必须吃透原文……………程二如 123

大型汉语字典中的例证问题·····	单殿元	126
汉字部首发展初步探讨		
——兼谈大型语文字典的部首原则·····	邵世强	151
疑年录补六十例·····	林仲湘	179
广古书疑义举例(续)卷七、八·····	徐仁甫	197

继承前人成果 反映时代学术水平

——《汉语大字典》主编徐中舒教授在第七
次编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一月八日）

编写《汉语大字典》要求是很高的，范围也是很宽广的，上下古今，无所不包。我担任主编这个职务有些勉强，只好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

根据计划要求，要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初稿，时间是很紧迫的，任务也是艰巨的，困难也是很多的。但从已进行了六年的编写工作来看，完成编写任务的基础还是好的。因为，我们已经编写出了不少油印本，有些规模了。我们还有指定的十三部字（词）典作为基本的参考，继承前人的东西便有所依据。虽然一些字典离我们已有些时候了，象《康熙字典》离开现在已两百多年，《中华大字典》离我们也差不多四、五十年了，《大汉和辞典》离现在大概三十多年吧，一九七九年版的《辞海》是最近的，离我们一两年了，我们可以参考这些字词典，引用其中的材料。另外，我们自己也作了不少准备工作。譬如四川的同志就编了《广雅疏证》通检。《广雅疏证》是乾嘉时代最高的成就，这部书过去没有充分利用，现在我们把它剪了作为参考，这是一个很好的编写条件。还有，我看到《词典研究丛刊》上有杜道生同志对于《中华大字典》的《校阅琐记》，把《中华大字典》应该改的材料，都有个校记，共有一百九十八条可供参考。还有已经出版了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对编写字典也是有参考价值的。但是，这本书因为时间仓卒，当时不可能在形音义方面作出

详细的说明。现在我们正在编写的《甲骨文字典》，争取在今年底搞出一个初稿，看有什么可供编字典使用的，不过恐怕赶不上需要。编写字典首先要依据字形，有了字形才能探索音和义。川鄂两省字形组同志共同编写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的编写工作也快完成了。这样，甲金文和秦汉以后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的字形资料也就齐备了。所以说，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好的，但还要继续作。

当然，编字典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抄书就有哪些地方应当抄，哪些地方不应当抄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经过自己的考虑，用自己的话明白简洁地表示出来。有些过去解释了的字，如《说文》的一些话很简单，过去注家讲不清楚，就要我们用现代的话解释清楚。文字从发生到发展，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一个字从前是怎样写的，意义是什么？后来又怎么写，有什么另外的引申意义？我们要仔细考虑，按时代的先后次序排列出来，这需要我们下一番大功夫的。我们一方面要很好地继承前人的成果，要照抄照搬，承袭正确的东西，一定要抄好，这一部份很重要。另一方面要改正从前字词典的错误，这一部分并不很多，但也很重要。我们要反映语言文字研究的新成果，要反映时代的水平，这点是我们编写字典的同志要特别注意，要大量解决的问题。我个人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过去搞文字研究的同志对有的问题，尚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既要择善而从，还要用简洁的话概括出来，这是要在编写工作中经过大量的实践才能作好的。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譬如我们现在说的鞋子，从前叫“屨”，又叫“屨”。这两个字古代是有区别的。《诗经·魏风·葛屨》：“纠纠葛屨，可以履霜。”屨是鞋子，是名词。屨呢，本来不是当鞋子讲，是当穿鞋子走路讲，是动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用晋人蔡谟的说法把这两个字分辨得很清楚。段玉裁对此很称赞，认为讲得非常之精。屨由穿鞋子走路引申为鞋子，把动词变作了名词，只是汉代人的事。在春秋以前屨和屨两个字是分别得很清楚的。这说明文字有先后次第，意义也就有所引申、有所变

化。象这类文字，我们在字典上要反映出来。再举一个字作例子。譬如“偷”字，在古代并没有窃取的意思，东汉末郑康成对《诗经·唐风·山有枢》：“他人是偷”的解说里才把“偷”作窃取讲。《诗经》里的偷字和现在通行的偷字写法不同。象这一类字我们要在字典上反映出来，使人晓得文字意义的变迁，凡是过去讲得好的我们都要尽量地抄。过去讲得不够全面或不符合现代需要的，简单的办法我们可以按《说文》和《康熙字典》的部首把偏旁相同的字集中在一起，再按《说文通训定声》或《经籍纂诂》把声类相同的字集中在一起，把这两部分材料集中起来，从字形字音两方面探寻其本义和引申义，就可以改正或补充前人不足的地方。我们的字典要反映我们时代的学术水平，不要再把前人的错误继承下来了，这是我们字典应当负的责任。

字典不仅要涉及语言文字，还要涉及科学的各个领域，要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改正前人的错误。譬如说“稷”，本来是北方的小米，南方人对于稷不大认识。程瑶田的《九谷考》是很有名的著作，我们讲九谷都要引用这本书。程瑶田是清代的经学家，是南方人。他虽然到北方农村访问过，却把“稷”说成是高粱，搞错了。高粱比小米大，长得高。段玉裁、王念孙讲稷都是从程瑶田的说法。现在字典词典中这类错误的说法还是没有完全肃清。我再讲一个“桓”字。桓就是华表，今天天安门前的两根石柱，还保存了古代桓的样子。从前是怎么讲的呢？四植为桓，就是四根柱子为桓；或者双植为桓，就是两根柱子为桓。从前的字典就只讲这些。一九七九年版的《辞海》讲桓，引用这些话认为桓就是柱子，桓虽然有四根或两根柱子，但桓的得名实由于柱子上端四出或两出的小横木作为表示道路方向或宫殿城府所在的标记而来。柱上四出或两出的横木，有似于花，故谓之华（花）表。古谓之表今谓之标，表就是标记。桓本来只有两根柱子，中间并无横梁连贯，如今天安门前的华表，后来遇事增繁，又在两旁增加两根柱子成为四植。最近，河北出土中山王宫堂图，注明

桓有中桓和草桓之分，中间两根要高些称为中桓，两边要矮些称为草桓，中桓草桓之间再用两根横梁连贯起来，在这两根横梁之间，再用扁或坊镶嵌起来，这样的桓就完全和今天所常见的牌楼和牌坊一模一样了。牌楼牌坊之牌沿袭草桓之草也是很清楚的。由此可见，古代的桓和华表只是作为指示道路方向以及宫殿城府所在的标记，而不应当讲为柱子。象这一类的字，过去讲错或不完全的地方，我们的字典要加以改正。看字典的质量，就要看我们改正前人错误的多少。

再说现代的字典就是要反映现代最新的成就，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进步，我们的字典要增加新东西，这也是我们编写字典的任务。各方面的东西，如草木虫鱼、动物植物各种科学知识，我们都要了解，不仅要靠书本，而且还要进行调查访问，才能反映出当代最新的成果。我自己知道的不多，主要是了解一些文字学方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古文字的形体集中起来，看它们的变化。我们的字典要反映这个时代文字学研究的新成果。古文字学的兴起，从北宋以来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一八九九年甲骨文出现了，更促进了古文字学的发展。现在出土的殷商晚期甲骨约有十六万片，都是从盘庚迁殷到殷亡二百七十一年间的遗物，可以分为五期，它对文字形体的变迁，提供了许多范例。金文比甲骨文沿用的时间更长，把甲骨文、金文这两种材料结合起来研究，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材料多了，研究也就容易了。研究古文字，我们一方面要熟悉古文字的各种形体，另一方面要熟悉古人造字时候的生活情况，要深入到古人的生活里去。只从书本上从声韵学考虑问题是不够的，不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单独解释，要用字与字之间的大量材料来说明这些问题。现在的材料已不少，基本上可以说明一些文字的源流，这也是古文字学可以突破前人的道理。我们的字典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质量就比三、五十年前的字典质量高多了。我举个例子。譬如甲骨文的“言”字，就象舌头，下面的口形象嘴，上面是大字倒转过来的形状，

象舌头活动的样子。甲骨文里的“言”、“舌”、“告”都象舌头的形状。后来告字上面的舌形变成了牛形，可见许慎《说文》说告是牛触人是不对的。告、舌、言的原始意义都是舌头。言字怎么说象舌头呢？甲骨文里有个𠂔字，正象舌头向下对着酒坛。饮酒说话就要摇动舌头，所以从前造字就画个舌头。这样一个原始形象可以表示三种意思，可以作告诉人的告讲，作言语的言讲，作舌头的舌讲。言字的本义是舌头，过去没有人讲过。告、舌、言这三个字，甲骨文里都作为告诉的意思讲，以后一个字形分化为三个字。又譬如月字与夕字，最初也是不分的，中间可以有一点，也可以没有一点，你说它是月可以，说它是夕也可以，又如行路的行（𠂔），最初就是十字路口，中间是相同的，后来逐渐省变成了彳、亍二形作为形声字的偏旁。所以，研究文字要从甲金文的源流着手，不能完全依靠《说文》。《说文》有不少错误的地方，每个字它都要解释形体，而文字经过辗转传写易滋错误，一些错误的字约定俗成也变成了正体字，《说文》要解释这些错误的字形，难免穿凿附会。我们这样完备的大型字典，不用《说文》很困难，但是在使用《说文》时，对它错了的地方必须加以说明，用新的研究成果改正它。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古文字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订正了不少《说文》的错误。我们现在编写的这部字典就要总结这些成果，改正过去的错误。

最后还谈一谈异体字的处理问题。在刘又辛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对异体字的处理也作了不少准备工作。甄尚灵同志有篇谈通假字的处理问题的文章，说得很好。异体字在《说文》里是作为或件、古文、籀文、奇字处理的。凡这个字同那个字，含义全同就可以直接说同，不能说是通假。有时两个字的意思，只有这一部份和那一部份相同，还有一部份不相同，就只能说是通假。处理好异体字，对于将来的文字改革是很重要的。我们编写大字典，也要为后人着想。怎样使文字更加统一，更加简化？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鲁 迅 谈 辞 书

周 启 付

辞书是文化学习、语言研究、翻译工作必备的工具书。在1920年11月14日鲁迅在致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的信中指出：“我以为目前研究中国的白话文，实在困难。因刚提倡，并无一定规则，用词、造句皆各随其便。钱玄同君等虽早就提倡编纂字典，但尚未着手，倘编成，当方便多了。”（《鲁迅书信集》下卷，1070页）

没有汉语字词典，不仅对外国人学习汉语非常不便，对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对于某些常用词字的理解并不都能够做到确切，鲁迅以自己为例说：“因为我实在连自己也不知道‘嵯峨’和‘嵯岩’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形容词，是从书上钞来的，向来就并没有弄明白，一经切实的考查，就糟了。此外如‘幽婉’‘玲珑’，‘蹒跚’，‘嗫嚅’……之类，还多得很。”所以鲁迅指出：“须有字典以确定所含的意义。”（《且介亭杂文二集·人生识字糊涂始》）

在学习外语、进行翻译时，更是离不开字典了。鲁迅在指导青年学习外文时，指出“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鲁迅书信集》下卷996页）“硬看”就是大量阅读，“翻生字”就是翻字典、查生字。

在翻译时，即使如鲁迅那样精通日文的大作家，没有工具书也不能进行工作。他曾自述在翻译《死魂灵》时的情形是：“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那是因为要使译文能保持原作的丰姿、讽刺的锋芒及对书中陌生的古老用具的准确，所以译得很吃力，离不开字典。鲁迅还在《小约翰·前言》中，介绍了他是如何查得书中小姑娘 Robinetta这个名字的含义的。Robinetta是何意义，他久不能得。后托精通英文的江绍原查，江回答是：“Robinetta，韦氏大字典人名录未收入。我因为疑心她与Robin是一阴一阳，所以又查Robin，看见下面的解释：——Robin，是Robert的亲热的称呼，而Robert的本名是‘令名赫赫’”。于是鲁迅就译作“菜儿”。他还联想到英国民间传说加以阐明：“英国的民间传说里，有叫作 Robin Good Fellow的，是一种喜欢恶作剧的妖怪，如果荷兰也有此说，则小姑娘之所以称为Robinetta者，大概就和这相关……。”这里很具体地说明了鲁迅是如何活用字典，从同源字、字根、相关词、字的变体上多方查找，才能获得正确答案的。

对于大型的系统介绍知识的百科全书，鲁迅也很重视。如对苏联1929年开始出版的《文学百科全书》，他的评价就很高。在1935年4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说：“《文学百科全书》一本，也接着收到了……此书好极。要用文学家画像，是极为便当的。”（《鲁迅书信集》下卷801页）鲁迅自己也很注意搜求百科全书，如其藏书中就有《文艺辞典》、《世界文艺大辞典》（其实是文艺百科全书）、《美术百科全书》、《简明大学百科全书》等。鲁迅在杂文中谈到“叭儿狗”一名“哈巴狗”时，指出很多人以为它是“外来货”。其实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也是鲁迅经常翻阅百科全书所得，上述之书即《英国百科全书》。

旧辞书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但它不是万能的，不要迷信。鲁迅就曾针对章太炎反对白话、认为白话文比文言更难的意见说：“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

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但实际无须如此，乃是章太炎“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所以“文不对题”，“牛头不对马嘴”。（《且介亭杂文二编·名人和名言》）

鲁迅强调应多向人民、向实践学习：“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他们接受、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两岁，就懂许多话，能说许多话了，这在他，全都是新名词，新语法。他哪里是从《马氏文通》或《辞源》里查来的呢，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他是听过几回之后，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关于辞书的编写，鲁迅也发表过不少精辟的意见。如在回复老友陈澧欲编写字典与入研究院的询问信道：“国学研究所中尚未拟办此种事业”，指出在当时反动统治下，编制字典一事根本未曾列入计划，并感叹道：“要之一涉目前政局，便即不耻不尴。”（《鲁迅书信集》下卷206页）指明辞书事业无法开展。

1934年5月11日在致增田涉信中，对编辑《大辞典》提出建议：“《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庞然巨著，书是见过的，却从未仔细阅读过。我以为如非中国文学专家，则毋须购藏，但为编辑《大辞典》，也许是适用的书。”还指出要博采诸家成果：“如仅用《辞源》、《通俗编》来对付，我以为太贫乏。此外，可从《学史精华》与《读书纪数略》中摘录些认为必要的东西放进去如何？或从《骈雅训纂》（比《骈字类编》简明）亦可略为采择些。”（《鲁迅书信集》下卷，1176页）讲得非常具体。

对外国好的辞书，也要虚心学习。鲁迅在翻译《小约翰》时，就发现了日本辞书比当时中国唯一的《植物学大辞典》（杜亚泉等编）在某些条目上解释得好。他举例道：“Buch是欧洲极普通的树木……日本叫做枳（Buna），他们又考定为山毛榉。

《本草别录》云：“榉树，山中处处有之，皮似檀槐，叶如栝櫟。”很近似。而《植物学大辞典》又称栲，栲者，柏也，今不据用。”（《小约翰附录二：动植物译名小记》）这里是杜亚泉搞错了。

虽然国外有些辞书是好的，但鲁迅并不赞成照样搬用。他指出《植物学大辞典》上的名目，“虽然都是中国字，有许多其实乃是日本名。日本的书上确也常用中国的旧名，而大多数还是他们的话，无非写成了汉字，倘若照样搬来，结果却等于没有。我以为是大大不妥当的”。（同上）批评了生搬硬套，食而不化的做法。

关于辞书辞语收录，鲁迅的一些意见也值得参考，他很注意从生活中汲取新的词汇，曾自述：希望“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并指出：“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如：“阿木林”（吴语方言，傻瓜意），“活得弗靠活”（绍兴方言，活得不耐烦意）鲁迅即在致章廷谦信中引用。我们的辞书工作者，对各地的方言土语注意得很不够，至今尚无一本俗语辞典出版。但是对于一些生造的怪字，鲁迅却是很反感的：“直到现在，中国还在生出新字来，但是，硬做新仓颉却要失败的。吴的朱育，唐的武则天，都曾经造过古怪字，也都白费力气。现在最会造字的是中国化学家，许多原质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认得，连音也难以读出来了。老实说，我是一看见就头痛的，觉得远不如就用万国通用的拉丁名来得爽快，如果二十来个字母都认不得，请恕我直说：那么，化学也大抵学不好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这里并提出了化学名词定名的一种合理建议。

对于别字处理，鲁迅曾以其丰富的文字学知识，说明某些别字在古代的今文尚书、甲骨文字中倒是正字。何况“现在一般人所谓‘正字’，其实不过是前清取士的规定，一切指示，都在薄

薄的三本所谓《翰苑分书》的《字学举隅》中，但二十年来，在不声不响中又有了一点改变。从古迄今，什么都在改变……”。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批评了抱守残缺、畏葸不前的做法。

辞书一般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也易生保守性，特别是一些著名的辞书，往往排斥或忽略新字、新词的吸收。鲁迅一贯重视革新、创造，他的话值得我们深思：“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同上）停滞不前，决不是一条生路：“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同上）这些话充满了辩证法，说得多好啊！愿辞书工作者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编写出更多高质量的辞书来！

试论词典的通假处理及其意义

陆 锡 兴

通假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疑案，也是语文词典编纂的一个难题，许多同志都很关心它的研究讨论，并各抒己见，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目前，我国《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这两部大型语文辞书正在紧张地编纂，专门的通假字典正着手进行，鉴于通假在汉语辞书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处理它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从理论上阐明通假的实质，并客观地确定它的地位，以寻求在字、词典中科学的编纂办法。

一

通假是古老的汉字带来的复杂问题，只有在充分认识汉字特性的前提下，才能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

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能离开语言而独立存在。文字只有通过代表词的读音，才能获得词义。它是一切文字的基本特性，汉字当然也不例外。汉字的表音性，我国古代学者早就有了认识，特别是清代学者曾经反复强调这一点。钱大昕说：“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训，此一贯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①王筠讲得更加明白：“夫文字之奥，无过形、音、义三端，而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义为本，而音从之，于是乎有形。后人之识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义，而文字之说备。”^②由于人们长期使用习惯，形成了字即是词的观念。所

以，认识这个理论，并且按照这个理论去实践，是很不容易的。相反，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从事形上去寻求词的概念，而不是从事音上去寻求词的概念。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用一个符号代表口语里的每个词，这样的文字体系就是所谓表音文字，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文字的重要特点恰恰就是，字并不是代表实际世界的特征（“观念”），而是代表写字人的语言的特征；所以不如叫作表词文字或言词文字（word-writing或logographic writing）。”③

总之，具有象征性符号的汉字，本质上还是通过代表词的读音来代表某种意义的。

但是，表意文字有着与一般文字不同的一面，它是用象征性符号建立起来一种特殊的文字体系。它依靠象征性符号通过社会的俗成约定，达到字词的固定结合，形成字（词）形规范。历史记载，从秦代起，就开始进行汉字的整理统一工作，到东汉《说文解字》的问世，逐渐完成了汉字的规范系统——正字。

“每字依形说其本义，其说解中必自用其本形本义之字，乃不至矛盾自陷。”④“正字”从字音出发，提出了形义标准，“说义出于形，有形以范之，而字义有一定，有本字之说解以定之。”⑤正字系统不断地补充完善，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规范字系统。

这里所揭示的表意字的表音性和表意符号性的矛盾，即是以音用字与以形定字的矛盾决定了上古古籍用字和正字不统一情况，它主要表现为同词异字（或称同字异形）。同词异字一般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异字与词的正字意义相同，即成为异体关系。如“德”是“道德”词的正字，《易·乾》：“君子进德修业”，就是一个用例。而中山王壶铭文：“是有纯惠遗训。”银雀山汉简《尉繚子》附《兵令》：“兵者凶器逆惠”。这里的“惠”是“德”的古体，两字意义相同。第二种异字是异词同音，它们各是不同的正字，分工明确。如《孟子·告子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荀子·成相》：“尚得